

---

# 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

——面向新中国学的构筑——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爱知大学)

## 导言

伊拉克战争使得人们对欧美特别是美英两国中作为地区研究的“伊拉克研究”的性质和学术水准再次产生了疑问。

首先，美英两国以萨达姆·侯赛因进行非民主的独裁统治和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将英美“先发制人”（的理论）予以正当化，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其次，但是美英两国在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后并不只是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没有对伊拉克社会的文化宗教背景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的军事占领统治不仅漠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在各个方面破绽百出。

结果美英的占领不仅未能实现安定的统治，还造成了比萨达姆独裁统治时期更为严重的社会秩序的丧失和混乱。

美英对伊拉克的占领统治本来准备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远东军司令部对日本的占领统治模式的。众所周知，美英以其“日本研究”的深厚积累为基础，有效地利用了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和理解，成功地把握了日本国民的人心，实现了相对安定的对日占领统治。

为什么美国二战后对日本的占领统治获得了成功，而现在对伊拉克的占领统治却漏洞百出呢？这里我们很容易地就会联想到美英当时的“日本研究”和现在的“伊拉克研究”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 I

“伊拉克研究”和“日本研究”在两个方面存在着典型的差异。一是对研究对象国的文明或传统文化的评价；二是对研究对象国的近现代文化（原文：同时代文化，意指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同时代的非西方的文明文化，译注）的评价问题。

首先，当今美英对伊拉克传统文化的评价中，在高度评价底格里斯、幼发拉里河（Tigris/Euphrates）古代文明的同时，对7世纪萨桑王朝（Sassanids）波斯王朝（Persia）崩溃后伊斯兰教的乌马亚王朝（Umayyads）的兴起直到今天的伊斯兰文明却几乎都持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将伊拉克或中东的阿拉伯文化、文明割裂为古代和近现代，在肯定古代文化的同时否定近现代文化的做法比较流行。<sup>1</sup>

与此相对照的是，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是从古代到中世纪、近代、从古代天皇制、武士统治直到明治以后的近代天皇制的日本文化，并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历史上的不同断层，而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强调日本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产生日本“法西斯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体制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也重视其对日本现代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sup>2</sup>

对传统文化评价上日本和伊拉克之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第2点、即对当代文化进行评价的问题。因为即使同样被划进了“地区研究”的领域，在美英的“日本研究”被列入“发达国家研究”（直到二战后的60年代前期为止一直被称为“落后国家研究”），属于“先进国家研究”的范畴。而“伊拉克研究”或“伊斯兰研究”还是被列入“发展中国家研究”。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奇迹般地走上了西欧型的现代化道路，到二战前的昭和时期业已成为世界大国，跻身于列强之列。战败后的日本也很快开始战后复兴，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巩固了经济大国的地位。笔者认为正是日本的西方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才使得人们更支持美英“日本研究”对近现代日本文化予以肯定的观点。与此相比，近现代的伊拉克以及近现代的伊斯兰世界直到今天也走着与西欧的现代化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亨廷顿博士的《文明的冲突》论就把这种与西欧式现代化不同的伊斯兰现代化认定为引起文明间冲突的元凶。当然，在这里对近现代伊斯兰文化持否定态度的观点也就十分有力了。“伊拉克研究”或是“伊斯兰研究”被列入“发展中国家研究”的范畴正是由于这种“比西欧现代化发展慢”就是“落后”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的对近现代伊斯兰的否定性评价。

作为“地区研究”一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文化的否定性评价，与对其古代文明的肯定性评价呈对立关系，两者以平行方式存在着。因此正是这种将近现代和古代进行历史割裂的双重文明、文化观，才造成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不仅对近现代的伊拉克进行破坏，也对古代文明的遗产进行破坏和掠夺的现象。

## II

我们再回过来看，实际上（海外的）中国研究也有否定近现代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古代文明从周直到明基本上都得到了肯定性的高度评价。就是说肯定在西欧的现代化成为历史发展主体之前的中国文化、文明。比如即使在中日战争（抗日战争）下的军国主义日本，一方面对近现代的中国进行军事侵略，一方面大多数的军事领导人仍尊崇直到明代为止的古代中国文明的历史，倾向重视儒学的教养和汉诗的创作。

结果在中日战争中，军国主义日本不仅对近现代的中国文化进行掠夺破坏，还漠视对古代中国文明遗产的保护，反而倾向于对其进行破坏掠夺。

即使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美英对中国的认识也可以说有同样的倾向。就是说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否定与对古代中国文明的肯定态度是相互关联、平行存在的。

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学术界一部分学者出于赎罪意识出现了肯定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潮流。这个潮流导致了60年代过度的中国礼赞论和毛泽东礼赞论，结果在7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的真相逐渐显露后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sup>3</sup>之后出现的又是

与二战之前和二战之中基本没有变化的对中国的看法，就是在否定评价近现代中国的同时肯定中国的古代文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家司马辽太郎的中国论。司马对春秋战国直到明代的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与此平行的却是他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极其苛刻的否定评价。

### III

综上所述，对近现代中国文化进行否定而对古代中国文明予以肯定的观点，不仅是日本学术界的倾向，在美英学术界同样的倾向也十分明显。当然这种倾向与“伊拉克研究”、“伊斯兰研究”中把近现代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看成是落后于西欧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地区”的固定观念如出一辙。这是因为近现代的中国尽管经济上已经腾飞，但在文化上依然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看法仍然占优。当然“发展中国家研究”中这样的弊端也表明在相互关联的“发达国家研究”的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弊端。

总之，当前在欧美和日本的“地区研究”中，尽管出现了1978年萨伊德（Edward W. Said）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和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说，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浓厚的东方主义的弊端。在这个意义上，构筑一个新的中国学的方法论，就必须从对近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双重标准的评价的“地区研究”进行批判开始。

我们还必须对“地区研究”中的“中国研究”在认识论上的诸问题进行方法论上的评论，但限于篇幅，笔者暂时予以省略，仅作为一个（遗留）问题提交给大家。

1 典型的论调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 在美国对战后日本的军事占领统治上，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的《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946》起到过积极作用。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传统文理解释为以“义理”、“恩”和“耻”等概念为中心的文化，并得出结论，相对于西洋“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当然这一方面是以西方的价值观贬低了日本的传统文理解释，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这种文化认定为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可以予以说明的具有合理性的文化。特别是直到60年代末为止积极介绍日本传统文化的唐纳金（Donald Keene）更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日本结合起来，重视其积极的侧面。

3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前期，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学术界中出现的盲目的对中国、毛泽东进行礼赞的议论，根植于政治伦理的赎罪感之上的“目的意识”和“目的论”，大大地混入了对近现代中国文化进行的“因果论分析”，这种将“目的论上的价值判断”与“因果论上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的结果导致了错误的对华评价。

当然，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伦理上的“目的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里并不是要对其进行否定。过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论及的“价值的自由”（Welt Freiheit, Value Freedom）概念正是为了克服这里的“目的论”和“因果论”。这一点对于构筑新中国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但现在由于篇幅的关系暂不予讨论。

（刘星 译）